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西部农村个案研究

——以重庆市花沟村为例

丁湘城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094)

摘要: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强大解释力, 因此, 被西方国家的决策圈看成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思路。以西部一个普通农村社区为个案, 从社区信任、参与网络、共享规范和合作水平等四个维度剖析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 并针对性地提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选择路径: 积极组织多样化和持续性的社区活动, 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平台; 加强社区各类制度建设, 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 加强农村社区传媒建设, 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良好环境。

关键词: 农村社区; 社会资本; 社区发展; 重庆市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2-0041-06

The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he View of Social Capital ——An Emperical Study on Huagou Rural Community in Chongqing

DING Xiang-c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 As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has an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s known as a new idea of resolv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Taking Huagou villag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community of Western China from four aspects as following: the trust, participation in networks, shared norms and the level of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Hence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measures:organizing various community activiti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syste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media so as to provid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the social captial.

Key words: rural communities; social capit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Chongqing city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 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周期性外流, 引发了农村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 导致社区的解组和部分功能的丧失。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认为农村人口的流出造成了农村社会“有流动无发展”, 乡村结构“有流动无突破”, 乡村秩序“有流动无安宁”的困境, 而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 除了人口流动本身的问题之外, 国家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体制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在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研究中是一个富有价值的解释性框

架, 基于这一认识, 笔者拟借用社会资本理论做一些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 在社会变迁和结构转型的大背景下考察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及对社区发展的影响, 以期发现一点对理论和实践有意义的东西。

二、社会资本及其作用的理论分析

(一) 社会资本概念

当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是从雅各布斯·布迪厄、格伦·劳瑞等人的研究开始的。在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波特等学者的努力下, 社会资本研究逐步理论化并引起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对社会资本分别作了定义, 如布迪厄(Bourdieu)(1986)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群体成员相联系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之总和, 它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

收稿日期: 2009-03-24

作者简介: 丁湘城(1978-), 男, 浙江缙云人,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管理。

持。”福山(Fukuyama)(1999)指出,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润滑剂,可以使人和群体或组织更高效的运作。”林南(Lin Nan)(2001)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行为人在采取行动时能够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因而,这个概念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它代表的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中而非个人所有的资源;二是获取和使用这种资源的权力属于网络中的个人。”张其仔(1997)认为,“作为一种资源的配置方式,社会网络相对于市场和权力配置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优势,社会网络和公有制的结合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丘海雄、边燕杰(2000)则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摄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卜长莉(2005)认为,社会资本是“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9)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它体现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而且,它只有建立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才可能是稳定的。

纵观国内外学者及机构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其观点分歧主要在于界定的角度、概念主体、范围等几个方面。如在界定角度上一些学者侧重于社会结构资源,另一些学者侧重于社会关系;在概念主体上,一些学者认为是个人,另一些学者认为包括企业、社团、社区等行为主体。

本文所指的农村社会资本是特定共同体之内的农村行政村及其基本组成单位如家庭、家族、邻里等社会组织的内部要素在长期相互交往,互惠合作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参与网络。

(二) 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发展的应用

国内一些学者引进的社会资本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较强解释力,其中,社会资本理论在我国农村自然资源管理、社区治理、农村公共物品、农村生活质量、农村环境保护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等众多领域得到应用,并取得相应的成果。如郑传贵(2005)在其《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以赣东项村为例》一文中,依次对农村社区微观层面:家庭

社会资本及其教育与养老功能;中观层面:家族社会资本及其经济功能和邻里社会资本及其互惠互助功能;宏观层面:社区社会资本及其社区治理功能进行详细分析研究,另外,还对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期社会资本变迁与重建问题进行探讨。奂平清(2002)《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研究——西北弓村实地研究》一文,以一个农村社区为个案,运用人类学实地研究和社会学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较为深入和系统地研究了农村社区各层次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运作状况。以往成果在研究视角上,从社会资本的载体、表现形式、作用、特征和影响因素等不同视角分析了农村社区各层次社会资本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但是,分析以往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目前我国农村问题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们并未对本土化的农村社会资本理论进行探讨,而是将外来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既定的工具;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一些相对特殊的地区和主体;缺乏对农村社会资本纵向的链合研究,还是对各个层次社会资本横向的整合研究。

三、花沟村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社区发展的制约

花沟村^①是西部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程中典型的行政村,辖10个村民小组,总户数为1102户,总人口为3377,其中农业人口3377,党员95人。幅员面积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654亩,其中田1804亩,土1850亩,人均耕地面积1.08亩左右^②。花沟村以农业为主,是自给型经济,主要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土豆和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果树和蔬菜。近年来,该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狠抓以生猪、果树、蔬菜等为重点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全村50%的农户改善了居住条件,饮用了清洁卫生水,电话和闭路电视实现了社社通,入户率达到60%以上。花沟村共有3家农户从事商品零售店,15户左右农户从事蛋鸭养殖,1家农户从事家兔养殖,2家面条加工厂。另外,全村约有1000多人外出务工,其中村里青壮年劳动力绝大部分外出务工,留守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因素给村民的思维和观念带来直接的影响,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切身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影响。该村村民到沿海城市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村民逐渐增多,是个典型的

流动中的农村。上述这些特征,有利于考察转型中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以及农村社会资本变化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又有利于分析转型过程中培育现代农村社会资本的途径。

本文通过对农村社区中信任、共享规范、参与网络及合作来对社会资本现状进行剖析。

(一) 社会资本现状

1. 农村社区信任状况

伴随社会转型、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的加速,社会分工使人们的共有知识减少,人与人交往的短暂性、匿名性、易变性增强,这削弱了熟人关系网络和熟人信任的效力,而新的陌生人信任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或建设得不够完善。因此,社会转型对传统农村社区的“差序格局”的信任带来冲击。花沟农村社区的信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花沟社区人际信任主要是以亲缘信任为主,普遍信任有选择地提高。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的限制,人们的关系领域和交往范围都相对狭窄,往往局限于“熟人”范围之内,日常交往的对象主要是亲朋好友、邻里乡亲等,即使与陌生人交往,也往往离不开熟人的引荐和参与。从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花沟农村社区信任文化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点,平均信任度从家庭成员、直系亲属等一直到一般是依次递减的。这种信任结构也正是差序格局的体现,即由自己到家庭成员、直系亲属、亲密朋友等一圈圈向外扩散,扩散愈广,熟悉程度愈低,社会信任度也就愈低。相对于特殊信任,村民对好朋友、工作伙伴等普遍关系的信任度有所提高,农村的信任半径延长。由于生活空间的转换,交往圈子的扩大,特别是业缘关系的建立,使得村民愿意或者不得不相信身边的朋友和工作伙伴,他们在外面陌生的世界里有着共同的利益和频繁的互动,这种生存状态则为普遍信任创造了可能性,同时也加强了普遍信任的重要性。

第二,干群信任水平下降,村民对村委的依赖感弱化。干群信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农村社区的信任环境。该社区内很少有集体活动,村中许多事情都是由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决定。在调查中,93.5%的回答者说他们与村干部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冲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干群关系好,这是由于早就形成了交叉的亲缘关系网络,村民在计划生育等方面一般不与村干部为难,村干部也不会为这些事过于得罪村民。缴税和计划生育遇到阻碍时,一般都是由乡镇干部出面

干预。这一方面说明了农村社区人情关系对干群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社区组织和领导的相对无力,干部组织能力相对缺乏。

村民对政府依赖比较强,而对村委的依赖感弱化。在问及“村子要取得发展,您认为主要依靠谁?”时,67.3%村民认为依靠政府,19.4%村民认为依靠村干部,13.3%村民认为依靠全体村民。经过深入调研,有接近一半的村民认为:干部的不正之风是影响目前社会道德和社会信任秩序的主要问题之一;村干部一般只能使自家致富,不能带动村民一起致富;有些干部办事不公,以权谋私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情绪对立。这些均致使村民对干部的信任逐步下降,导致“你当你的官,我种我的地”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不和谐。

2. 社区参与网络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打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推广,80年代初原有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管理体制被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取而代之,新的体制由于失去了直接管理经营生产的权力,其行政管理功能就大为削弱。这引发了农村经济秩序的变化,“导致了集体共同体社会的解体,农户再一次成为散落的马铃薯”,“乡村社会的结构单元又重新地复原为一个原子式的个体”^[1]。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准单位参与网络”在农村已经不再存在,而其它一些社会参与网络也随之而起。以下从家族宗族参与网络、邻里关系网络和现代型的公民参与网络对花沟社区的参与网络现状进行分析。

第一,传统的家族宗族参与网络有所复活,但是其功能“今不如昔”。家族宗族参与网络有着一定的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从经济上来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族形成、存续以及发挥作用的经济基础。从政治上来看,人民公社解体后,对农民的直接控制减弱,农民有了较大的自由,这为家族组织的复活留下空间,同时,由于农村控制力的减弱,社会秩序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衡,人们为寻求一个可以依赖的组织。从花沟调查的实际情况来看,与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家族宗族参与网络相比,由于生产和生活资料都控制在家庭手中,土地各分到户,这使得该村族长权威的经济基础得以削弱。换言之,依靠社会体制获得生存资源使家族权威失去了物质威慑性和精神威慑性,这使得家族宗族网络不能再有以往自然经济体制下那样强大的功能。

第二,邻里关系网络在萎缩,邻里功能有所削弱。在乡土社会中,农村邻里关系曾被认为是农村主要的社会关系,在农村中承担着特定的社会义务,体现着特定的社会功能:生产上互济,生活上守望相助,对晚辈的社会化,这些职能能够给村民提供所需要的认同、信任、情感等社会支持。随着农村社区人口外出流动的增多,分散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面临许多不可抗拒的风险,农户处于理性的思考中,对传统的邻里在社会互助中的作用重新认识和思考。据调研发现,花沟村村内邻里间的交往已不再具有普遍性,有的邻里家庭之间甚至在“红白事情”上也互不随礼现象,有时为了一些小事互不理睬、打架、咒骂,并最终互不往来。

第三,现代型的公民参与网络还处于萌芽阶段。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农民在需求范围和层次上的变化,以及近年来,地方政府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视,花沟村出现了一些由农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公民社会组织,如红白事理事会、老年人协会、小南瓜合作社和妇女舞蹈队等。这些组织虽然缺乏严谨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活动范围也较小,一般仅限于本村或本乡的地域空间内,但其社会影响却不可忽视,对农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如“老年会”从成立到发展壮大,为保障该社区的老年人利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社区妇女舞蹈队的成立,丰富了社区文化生活,给农村妇女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场所。

3. 社区共享规范状况

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是规范或者称为制度,其中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社区规范是由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人们长期交往形成的,这些风俗习惯、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只要形成了就很难发生变迁,即使要发生变迁也需要较长的时间。下面以花沟社区礼物交换为例。在花沟村,人们称仪式场合的送礼为“答礼”(或“随礼”),称日常生活中的非仪式化礼物为“人情”,“人情”在数量和质量上,一般都不太讲究,但它们在乡村社区社会资本创建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乡土生活意义的创造和社会网络创造、维持和强化方面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仪式性交换主要场合有婚丧嫁娶、生日和贺寿等,村里每逢婚丧嫁娶,必定会产生礼物交换现象。在农村,虽然这些场合中收到礼物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或其家庭)的社会地位和拥有关

系资本的多少,但从总体上来看,仪式场合中的礼物表达性的成分居多,而工具性成分相对较少。在仪式庆典中相互送礼是一种义务,是由村庄的规范和道德力量所驱使的。据调查,目前花沟村“红白事情”中,“大部分”和“有些送”的村民分别占48.21%和42.86%,而“全部都送”仅占5.36%。从随礼的情况可以看出农户邻里交往关系网的规模在变小。

第二,非仪式性、表达性送礼的情境有亲戚间或生产互助圈之间平日或过节时的互访、探望病人和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交换等方面。这种礼物不一定贵重,但却充满人情味,一般是按照接受者的喜好选送礼物,所以村民称这种送礼为“送人情”。如在花沟村,某家做了如肉馅饼、饺子和珍珠丸子之类的小吃,该家的女主人就会送给与自己(或自家)亲近的人分享。

“人情”式礼物交换的不仅仅是“物”,更是一种情感交流,它在给人们提供情感支持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功能,其实践意义在于“发展情感联系和培养私人关系”^[2]。

从花沟村礼物交换来看,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参与网络内,礼俗性规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受市场化的影响,契约性规范或者说法理性规范也开始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参与网络内开始出现。如在熟人间农具使用、畜力租用、私人借贷等方面也适当地收取一定的损耗费用、计工计酬、租借利息。另外,礼物交换习俗出现了一些变化,如走访半径呈现缩小的趋势、礼物由“实物”趋向于“货币化”。

4. 参与及合作水平状况

农村社区的居民由于生存条件、生活方式限制,自主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参与率低,农村社团性组织较少,即使有也相当不规范。花沟村的农民很需要合作,但有效合作却十分困难。在调查中间及“您是否经常参加村里组织的集体活动”时,回答经常参加、偶尔参加和从不参加分别占35.6%,51.8%和13.6%;而问及“对于村里的公共性事务,您是否愿意参与?”时,回答非常愿意、比较愿意和不愿意分别占39.2%,58.3%和2.5%。因此,初步认定,社区较低的参与率与较少的组织集体活动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农村居民在很大意义上是“被迫性不参与”,而非真正的不想参与。可见,村民社会参与率低其实只是在行为上的外部表现,而他们的社会参与热情其实是很高的。农村居民的“被迫性不参与”源于社会能够提供的参与途径和条件不充分。通过该村案例调查发现,农户有

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也有较好的合作愿望。因为合作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表现在许多农民之间都出现了一些自发性合作行为。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参与网络,尤其是缺乏现代型的公民参与网络,他们之间的合作很难找到一个平台,这抵消了他们进行合作的努力。

(二) 社会资本对社区发展的制约

从上述分析可知,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普遍的下降趋势和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政府、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网络远远没有形成;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参与社区活动的主动性比较差,社区意识不强;农村人际关系日益淡漠化;人际信任关系仍然以亲缘关系为主,普遍的信任关系还没有形成;网络性社会交换逐渐被非网络性社会交换所取代;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利”取代^[3],等等。农村社会资本的这种匮乏状态已妨碍了农民利益表达、利益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降低了社会的整合能力,对政府治理与农村社区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转型期利益格局的急剧变化造成社区居民之间低信任度。伴随社会转型,社区处在旧价值体系逐渐瓦解而新价值体系逐步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庭所继袭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包含了这样的认知:熟人是可以信赖的,生人是需要谨慎对待的^[4]。这种判断与交易主体继袭的认知型社会资本一致,其中出现的大量失信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判断。随着农村社区逐步开放,家庭“封闭”起来以获得安全感,这是一种对社会信任缺乏的适应性调整。可以说,社区内部的低信任度导致社区民众不关心社区事务、不愿意参与社区活动。

第二,社区正式制度规范的制定、实施及效果滞后于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村社区成员的伦理观、政治观、生活观和时空观等都呈现出日益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然而,农村社区正式制度规范的制定、实施及效果滞后于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且权威性不足,屡屡遭到民众的质疑,而非正式制度又较为分散,缺乏一致性,无法有效约束民众的行为,难以为集体行动提供切实有效的制度保证。

第三,社会网络不健全,社区组织发育迟缓。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农村社区组织、其他非营利组织和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网络远远没有形成,不利于增加

社区凝聚力和培育公共精神。

第四,社区居民的参与率和参与的层次都较低。通过案例调查发现,农户尽管有较强的社会参与意识,也有较好的合作愿望,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参与网络,他们之间的合作很难找到一个平台。而外来的项目如新农村建设,政府部门依然以强势态度主观假定居民的需求,这些做法取代或压抑了农民对社区建设的实际参与,并且当前多数社区居民参与都表现为“被动执行式参与”,其后果是社区居民的参与率和参与的层次都较低,而且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不足^[5]。

四、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

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实现社区良性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资本构成了社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社会资本的存量及其性质都会影响到社区发展的绩效。因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培育农村现代社会资本:

(一) 积极组织多样化和持续性的社区活动,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社会转型期以来,农村社区中需要农民集体参与的社区政治、文化和娱乐活动很少,村民缺乏交流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邻里之间因缺乏交流的时间、机会和平台而逐渐淡漠疏远。因此,组织多样化和持续性的社区活动,尤其是文娱活动,能激活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兴趣,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强社区成员对社区的认同感,促进社区社会信任水平和相互支持网络的建立。在一个共同体中,公民参与网络的密集程度左右着公民为共同利益合作的程度,网络越密,公民越有可能为共同利益进行合作。为了给村民提供交流的平台,为村民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村委会要根据当地村民的爱好和需要利用传统节日(如春节)大力开展各种文化和娱乐活动,把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村委会在组织这些活动时应考虑到同农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加深村民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还可以激活村民对社区的兴趣,增强农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乡村社会信任水平和相互支持网络的建立。

(二) 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平台

社区组织作为联系政府与百姓的桥梁和纽带,表

达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居民可以通过社区组织参与社区与政府的交流、对话与决策,为社区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从总体上来看,在当前的农村社区的参与网络中,以传统型家族宗族参与网络为主,而以功能性为主的现代公民组织的公民参与网络却为之甚少^[6]。因此,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建设,为农村社会民间组织提供稳定的发展平台,同时规范政府权力的使用,使之不过多干预民间组织发展,提高民间组织的自治性和独立性;二要促进民间组织本身的规范发展。我国农村社会的民间组织还处在起步和初始发展阶段,存在问题重重,例如社会公信度不高,以及“官民两重性”特征甚至较明显的行政性和官僚化倾向,种种弊端妨碍了其积极作用的发挥。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应重在对其“公共责任”的监管上,通过政府、社会以及民间组织本身等多方的努力,建立起“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有效监管体系,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7, 8]。

(三) 加强社区各类制度建设,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形成

良好的制度环境,既是农村社区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创造和积累“规范”社会资本的必然要求。加强民主治理的制度创新,为培育具有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积极公民提供组织平台。一是要明确村委会与村民议事会,议事会与村民理财小组之间的关系和职能的划分;二是要研究村委选举中的程序,使之更具公开性、效率性,更加易于村民理解和操作;三是要真正落实各项民主制度,真正规范村民自治的运作,这也是防止传统型社会资本在乡村自治中起消极作用的基础。在当前的部分农村,家庭宗族参与网络和一些宗教参与网络的复兴,对农村社区的治理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传统的家族势力和宗教组织如果不能加以正确引导与约束,最容易产生‘无道德的家族主义’的典型,用小团体的利益破坏整个社会的发展。”^[9]因此,应通过对农村社区各类制度的创新来防止这些传统型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使村民民主自治的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使社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保障与落实。

(四) 加强农村社区传媒建设,为社会资本的培育提供良好环境

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形成具有环境依赖性和路径依赖性。在传媒时代,传媒与整个社会系统的深度耦合,

使传媒的传播活动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成为社会资本无可逃避的背景。因此,传媒活动对社会资本的形成、消长和积累有着重要的影响^[9]。现代科技的发展使这一切都全然改观,电视、电话、手机和网络等现代通讯方式在农村社区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手机和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为社会资本的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社区传媒可以作为社区生活的记录者、报道者,推动居民之间的信息交流,引起市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提高参与水平;通过对社区事务和地方新闻的报道,完善居民之间的信息沟通,进而强化联络,增强信任;甚至介入社区生活,提高社区的活动效率。社区传媒还能促进居民之间面对面的交往,这也是提升社会资本非常重要的一环^[11]。

注释:

- ① 根据人类学的回避原则,论文中的地名、姓名采用化名,由于所考察村落在中浅丘交错地带,大多山沟之间开满红色的杜鹃花,姑且称之为“花沟村”。
- ② 村情简介由该村民委员会2008年9月提供。

参考文献:

- [1]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86.
- [2] 阎云翔. 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41.
- [3] 牛喜霞, 谢树芳. 新农村建设: 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J]. 江西社会科学, 2006(11): 133.
- [4] 程民选. 信誉: 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J]. 财经科学, 2005(2): 73-78.
- [5] 鲁兴虎. 社会资本与我国城市社区发展[J]. 科技信息, 2008(7): 19.
- [6] 俞可平. 中国民间组织与治理的变迁[A].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28.
- [7] 孙璐. 缺失与重建: 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探析[J]. 理论导刊, 2007(5): 45.
- [8] 赖晓飞.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9(5): 32-35.
- [9] 苗月霞. 社会资本视域中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作绩效[J]. 河北学刊, 2005(3): 205.
- [10] 王珊, 刘年辉. 大众传媒与和谐社区: 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 青年记者, 2005(3): 54-55.
- [11] 巩怀虎.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发展[J]. 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6(6): 30.

责任编辑: 陈向科